

剩、对本国工人和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的非市场做法。2018年9月25日，美欧日联合声明再次提出，要制定关于国有企业和产业补贴的新规则，以便为工人和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些措辞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关于数字贸易壁垒，美国、中国和欧盟在今年6月于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进行了直接的交锋。美国强调要推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反对数据储存的本地化。欧盟提出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同时要促进数据自由流动，认为数据碎片化和数字壁垒对世界经济增长不利，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不利。中国则强调数据流动的前提是国家安全，要确保数据的安全有序利用，同时要保留各国自主储存数据的权利，要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权益，防止南北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

第二，怎么改（谈判模式）。

美国方案提出要采用新的诸边谈判模式，即所谓的小多边模式，认为协商一致模式导致WTO谈判效率低下、陷入僵局。中国方案则提出，WTO要坚持遵循协商一致的谈判模式，改革议题的选择和最终结果应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来做出决策。同时，改革应坚持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不能以所谓的新概念、新表述混淆并否定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欧盟方案提出，一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协商一致；另一方面，在无法协商一致的领域可以采用诸边模式，并对愿意加入谈判的成员保持开放，谈判成果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普遍适用。

第三，改了以后怎么执行（通报和透明度）。美国方案和欧盟方案都提出要强化WTO成员通报和透明度的义务，以改善规则的执行：第一，设立通报义务程序工作组，对成员通报义务履行情况进行年度评估；第二，

在贸易政策审议中加入通报义务的审议；第三，对通报义务不达标的成员采取惩罚措施。中国方案认为，通报和透明度义务是一套对成员的纪律约束措施，虽有一定价值，但如果要采取惩罚措施则会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必须要区分“有意违约”和“无力履约”。

第四，改了以后怎么执行（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是WTO规则执行的基石，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但美国阻挠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导致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停摆的风险。欧盟方案和中国方案提出，WTO改革应优先处理危及其生存的关键问题，即尽快解决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问题：第一，将大法官人数由七人增加到九人；第二，将大法官任期由四年改为六年；第三，明确新法官遴选的时间期限。美国尚没有对欧盟和中国的提议做出任何回应。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全球经济治理视角下的价值链重构

文/马涛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法雷尔和乔治城大学学者纽曼在近期的《国际安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武器的相互依存》的文章。文章指出，在高度不对称的网络中，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对网络的中心节点拥有管辖权；具有足够的能力以命令那些管理中心节点的公司，那么国家就能利用“全景监管”和“阻断制裁”的方式达到强权政治的目的。无论是SWIFT系统还是互联网，由于国家强制权力的存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也就变成了一种被“武器化”的危险存在。

全球网络与全球价值链

SWIFT和互联网等经济网络可以被称为“虚拟价值链”，实体经济的就对应为“实体价值链”。两种价值链在治理结构上有相同点也有较大差别。虚拟价值链结构简单，强权国家处于核心位置，其他国家处于外围，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圆形管辖结构。由于强权国家具有中心节点的管辖权，就可以对外围国家实施阻断制裁。实体价值链则具有纵横交错的复杂结构，国家与国家在产业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价值

链的长度取决于产业或者产品的复杂程度，其分工格局与收益分配都是由该产品的跨国公司总部决定。

比较而言，实体价值链中跨国公司总部的“管辖权”远没有虚拟价值链中的强制权力那么大。即使被跨国公司“摒弃”，被摒弃的国家和产业也可能被同类产业链的其他跨国公司选用。从经济学角度看，实体价值链中的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弹性，对于参与价值链的企业而言，其不会被强权国家的跨国公司完全“阻断制裁”。但对于一些独一无二的高科技产品价值链，由于供应商找不到可以

转移的产业链，仍存在一定的被跨国公司“阻断制裁”的风险。

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 与区域价值链重构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演进，全球区域经济格局重构也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而发生。世界范围内新兴经济体通过增强自身全球竞争力，提升了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同时，发达经济体试图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以削弱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新兴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甚至方式，冲击着原有的世界格局、考验着现有的国际秩序。

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2015年，美国公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文本中的“原产地规则”，其目的是“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另外，TPP中“纺织和服装”章节提出的

“从纺纱开始”集中显示了更为苛严的原产地规则，其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等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到加工成成衣都必须在TPP成员国境内完成。这两条新规则突显了TPP对非成员国的排斥，这将会破坏产业链的最优化配置，是国家意志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体现。此外，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违背了美国《1974年贸易法》和世贸组织规则，正严重破坏全球分工格局和价值链体系，加剧各国在价值链上的竞争。

“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的扩展

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实现价值链扩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仅局限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致力于通过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更多沿线国家融入新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国与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的要素优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

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体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治理新平台，构建沿线国家参与的价值链，扩展全球价值链体系。

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价值链是开拓创新型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历史机遇，也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新契机。目前，北美、欧洲和东亚等较为成熟的价值链体系已不能满足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扩展了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以中国为起点，贯穿中亚、欧洲，远及被称为“一带一路”自然延伸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产能合作，以及沿线国家之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和产能合作，将逐步构建一个崭新的、循环互动的、“履带模式”的价值链体系。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国际关系

文 / 黄琪轩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第一次工业革命加速了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政治的主导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巩固了美国在美苏争霸中的优势地位。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正在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出现。尽管对此次工业革命还存在诸多争议，但这次技术变迁仍和历次变迁一样，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重塑世界安全，重塑全球化进程

在国际安全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会重塑世界安全，有加剧大国不安全的潜在可能。技术实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影响国家间实力分布，改变大国间的攻守平衡。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在相互确保摧毁的约束下，军事冲突得到有效控制，世界政治进入了“以防御占优势”的时代。但是，随着新一轮技术变迁的出现，大国之间摧毁对方核设施的可能性与准确性正

在极大提高。在1985年的时候，美国对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命中率为50%左右；到了2017年，这一命中率已经接近80%。随着隐形无人机、网络地面传感等技术的发展，一个大国的核武器库即便在今天看来是安全的，未来也可能变得脆弱，变得容易受到摧毁性打击。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会让国家安全更加具有暂时性、可逆性的特点。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会重塑全球化进程，甚至存在加剧全球化进程曲折性的可能。